

思想素质

凡是接触过韩国人或韩国文化的人，一般都听说过“阿里郎”。的确，对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来说，“阿里郎”的知名度可能并不比人们常说的“汉江奇迹”差多少。在一定意义上，“阿里郎”已经成为韩国和韩国人在世界的一种象征。因此，有人甚至叫“阿里郎”为韩国的第二国歌。他们猜测，如果有一天朝鲜半岛的南北方组成联合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阿里郎”有可能被选为他们共同的“国歌”。

“阿里郎”在世界的魅力源于它故乡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是韩国秀丽的山川和多变的气候，是勤劳的韩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养育而成

的。“阿里郎”在韩国可以说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有多少山就有多少“阿里郎”，有多少河就有多少“阿里郎”，有多少村落、有多少方言就有多少“阿里郎”。据说，仅拥有自己“历史”的“阿里郎”就有 7—8 种，如果包括那些以地方民谣形式流传下来的“阿里郎”民谣甚至多达 25—30 种。

“阿里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一直延伸到历史上的部落时代。至于“阿里郎”所包含的意思，各种“考证”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仅有有名有实的就有十六七种。很显然，无论是从它的音乐特色来看，还是从它在韩国社会所起的影响来说，“阿里郎”不愧为韩国的第二国歌，不愧为韩国人的民族象征。

在现代韩国，“阿里郎”曾经历过两次高峰时期，一是在李氏朝鲜王朝的末期，另一次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二三十年代，其中，1926 年由罗云奎导演，反映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精神的影片《阿里郎》，对该民谣的普及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经过民族的苦难历程，“阿里郎”已经成为韩国历史的缩影，成为广大劳苦大众与疾苦抗争的呐喊，成为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吼叫。

“阿里郎”是扎根于生活中的人民音乐。它以韩国人十分喜爱的四分之三拍子的节奏，走进劳苦大众之中。它时而高兴，时而悲壮，时而快速，时而缓慢，如实地反映了百姓的酸甜苦辣。它懂得适应生活，也懂得适应环境。它从不摆架子，只要人民需要，它就可以改头换面。这是它深入到韩国的村村寨寨，到处生根发芽的关键所在。

“阿里郎”，我们通过它看到了韩国人的充满悲愤的民族历史，看到了他们的要摆脱压迫、憧憬未来的民族精神，也看到了他们的实在和情感，更感到了他们的不屈不挠和奋斗不息。

● 韩国人的思想源流

韩国人的思想源流大体有以下 3 个方面，一是韩国传统的思想来源，主要以萨满教为特征；二是古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佛教和儒家思想，其他的还包括道家等思想体系；三是自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各种思潮。

基础——萨满意识

与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一样，韩国人的原始宗教也是崇拜大自然的。韩国的高山峻岭被人民赋予神奇的力量，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播下很多“山神”、“山神灵”和“人乃天”的意识。

不管是这些原始宗教，还是发源于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并对韩国人产生重大影响的萨满教，它们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在伦理、哲学方面，倒不如说是“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不幸或解决眼前的困难。这是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它容易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人们意识中难以自拔的基础，支配着韩国人的潜意识。由于这些原因，不仅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即使是那些佛教或基督教的教徒，他们经常在无意识中成为这种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俘虏。

正如各种植物品种来到韩国逐渐具有韩国的特色一样，萨满教传播到韩国以后，在韩国民族生活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韩国的特色。如果说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中，萨满具有神的特征，以神的面貌出现，但在韩国，“巫”（即萨满）只是神与人类之间的中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巫”，而只限于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和气质的人，他们以特殊的动作和仪式，或者让神灵高兴起来，带给人们益处（如治病等），或者安抚那些不安分的神灵，远离人间世界。由于这些“巫”大都是女性，因此也称她们为“巫女”。

韩国的萨满教活动中更多的是人们感性的活动。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宿命论的怨天怨地，不论信仰何种宗教都追求现实的好处，每当各种宗教仪式前都祈求降临某种幸运，在信徒集会中并不是以理性理智的活动而更多地是受潜意识支配的狂热的行动，显示和强调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存在。也许是由于这些传统的影响，韩国社会至今十分流行各种算命，到处是各种算命面相的所谓“哲学”小屋，以祈求神灵的帮助。

与其他的宗教信仰相比，韩国人的萨满行为有自己较明显的特点。在形式上，更讲究情绪的调动和发泄，并伴随着各种跳舞、唱歌等形式，把人们带入各种朦胧世界，以期人们相信这种神力的存在。由于这些原因，在外人看来显得具有更强的情绪化、艺术化的特征。在时间上，举行相关活动的目的并不在于遥远未来的终极世界，而是要回答或解决眼前的问题或难题，具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另外，这种现实的“巫”所具有的超

凡能力和威望，与韩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相结合，又形成韩国特有的伦理观。因此，尽管同样受我国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但韩国的家族主义与我国相比显得更为“专制”，至今仍然严格遵循父子有别、老幼有别和主从有别的原则，不许欲望和情感的任何程度的表露。

大邻居，大影响

在中韩刚刚建交的时候，有些人看到韩国的国旗感到有点纳闷，说：“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太极图吗？”

的确，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太极图是那样的熟悉，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精髓。它的影响却并不限于中国的国土。无论是在韩国还是日本，这太极、这“周易”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悠久而广泛，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人无不晓，社会上还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团体，力求把其中的深奥原理运用到社会和经济生活之中。这种影响在韩国尤为突出。

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韩国的国旗。当然，对它的解释有韩国自己的特点。国旗中央由红青两种颜色组成的太极分别表示阴阳，它们以对称的图案，表现虽然对立但又不可分离、互为条件的客观世界，如火与水、白天和夜晚、男人与女人、酷暑与寒冷、加法与减法，等等。四个角落的四组爻分别表示天、地、火与水。白色的底色代表韩国民族的单一性，也表现韩国人爱好和平的纯洁性。整个国旗象征着与客观世界和谐相处和不断进步的韩国人的精神世界。

其次是韩字。韩字是李氏朝鲜王朝的第四代国王世

宗（在位期 1418 年至 1450 年）主持下于 1443 年创制，于 1446 年以《训民正音》的名义发布的。研究和制定该文字的学者们在思考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受到当时就已经广泛流传的《易经》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运用了易经的原理。例如根据《易经》“天地之到，阴阳五行”的原理，根据天地人三才，制定、、 等 3 个基本字形，分别代表天、地和人。然后，又根据“天圆地方”的原理，以 、、 分别代表天、地和在天地之间的人。这两组对称的 3 个字符分别构成韩国文字元音和辅音。即前者的不同组合构成为元音，而后者不同组合则为韩字的辅音。在这些字符的组合方式上，创制韩字的学者们也没有忘记易经中两极对称的原理。例如，在一和  的上下、左右的对称排列，构成了现代韩字的 10 个元音。

与中国一样，在传统农业生产的条件下，也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也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而且希望多子多孙以保稳定和安全。一个家庭里人口多达十几个人甚至更多并非罕见。在家庭内部一家之长是绝对权威，全家人都应听从或遵照他的意愿行事。对韩国人来说，儿辈或者孙辈违抗长辈的意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人们把修身、齐家和治国看做是最高理想和境界。因此，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那就没有资格治理国家。

韩国人在传统上也很重视贞节。丈夫亡故以后，一般妇女都守节在家侍奉公婆，不再改嫁，对年轻少妇来说也概不例外。在有的情况下，有些女孩子甚至在未婚

夫亡故后也终身不再嫁人。

“孝”被看做是做人的基本因素和前提。传统的家庭观念表现在孝道上，尤以父子关系为重。不过，韩国人所提倡的孝道并不仅仅针对父母，它还关系到一个人在与他人来往中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为人。根据传统，孝道观念甚至反映在人们的对话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谓上，根据身份的不同，其中有十分复杂、细微的原则和规矩。要是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和规矩，说话不得体，就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因此，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在外边的工作和社交环境中，人们都很注意说话时的这些规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韩国各地有很多纪念忠臣、孝子和贞女的建筑物。这类建筑物一般都比较讲究，造价比较高，但人们一般不计较。

现代化的洗礼

自近代以来，韩国主要受到了两个大的外来思想意识的影响，一是自 19 世纪末到本世纪 40 年代中叶的日本的影响，另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的巨大影响。

如果从 1905 年的《乙巳条约》算起，日本对韩国的实际控制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不管日本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统治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韩国人接触到西方现代思想意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日本充当了西方思想文化传入韩国的中介角色。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思想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中借用很多日

本的概念，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日本的渗透。加上日本殖民当局对韩国传统思想的有意贬低和肆意破坏，使韩国传统思想文化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摧残。不过，日本的这些做法并没有发挥他们所期望的作用，韩国人对日本这个“中介者”的使用是有一定选择性的，一方面通过他们学习和吸收西方一些现代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则坚决抵制日本的思想渗透，捍卫、保护和发扬民族自己的传统。结果，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变成韩国人觉醒的历史契机，激发韩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他们逐渐成长为现代民族。

日本的投降，使韩国人摆脱几十年的殖民统治的压迫，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这时期在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是，外来文化不受限制的传入，使韩国人在历史上首次全面接触西方文明。

在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以解放者身份出现的美国居于特殊的地位。一时间，美国的思想文化毫无阻挡地进军韩国社会，以致在韩国的特定环境中引起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不了解韩国思想传统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人，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影响韩国社会，在一部分群体中出现以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为时髦的倾向。1959年有人惊叹道：“在不知不觉中美利坚主义渗透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商店里的商品到习惯、制度和思想，美利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①

①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国民意识和国家发展》，1982年，第137页。

应该强调的是，当时韩国所吸收的美国思想意识往往仅限于美国表面的思想意识，因此，不仅在实际作用上导致不少负面影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产生许多混乱，引起争论。随着与美国接触的全面展开和对美国思想意识的较深层次的了解，人们开始以较全面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思想意识对韩国的影响。这时期人们认为，美国思想文化对韩国的积极影响可概括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几个方面，其中普遍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主义等促进了韩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实用主义有助于消除传统的空谈空论的学风和歧视劳动的风气，而个人主义则有利于激发和提高人们个人尊严和自主、自强思想意识。关于美国思想意识对韩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则可概括为普遍主义的自由观导致无秩序和放纵；个人主义使利己主义得到膨胀，削弱集体意识，而实用主义引起拜金意识，淡化人们道德意识等。这些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①

关于战后美国的思想意识的影响究竟达到何等程度，产生多大的作用的问题，以数量众多的留美学生和学者为例，是否达到了使他们变成“美国佬”或韩裔“无国籍者”的程度？很多韩国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教育学者郑范谟曾对此写道：“与外国文化的接触首先使人感到本国文化的同一性的必要性。因此，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常常强化人们对韩国的国家同一性或文化同一性的认识和期望。人类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基础之上的所谓‘我们的感情’，并与‘你们的文化’形成强烈的对照。与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很多回国者的言行表明，在国外留学的人不仅没有忘掉‘固有文化’而沦落于‘洋风’，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民族文化同一性的依恋和向往。^①

无论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还是美国思想意识的大规模进军，都曾对韩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第二者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的影响，尽管也带进了一些糟粕，但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开阔了韩国人的视野，激发和增强了韩国人的现代民主意识，促进了韩国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同时，经过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和现代文明的洗礼，韩国人有可能以新的眼光审视民族的传统思想意识，全面了解“世界中的自我”和民族传统中的精华，这些对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讲究实际的人生之道

我国汉字传入韩国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因此过去在韩国稍有一点文化的人大都认得它。由于这些原因，韩国人在历史上也很讲究文字的构成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含义。

据说，在李氏朝鲜的时候，社会上属于中层水平的“两班”阶层的家庭，房子大小一般只有 10 坪左右，这

^①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国民意识和国家发展》，1982 年，第 139 页。

相当于我国目前的 33 平方米。房子如果比这大，就叫“屋”，比这小的则叫“舍”。如果把“屋”字进行分解，是由“尸”字和“至”字构成的，而“舍”则由“人”和“吉”构成。由此，人们觉得生活在大的“房”间有点不吉利，相反，小的房子则会给人们带来好运。也许是为了反映人们的这种心理，当时任六部尚书的李希俭曾对此说道：“家足以庇雨，衣足以蔽身，食足以充肠。”

这是韩国人处世之道的典型反映。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一定的物质条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例如孔子所说的“仓廩实则知礼节”，但前提却是不许任何程度的奢侈，其幸福观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禁欲基础之上。正所谓“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但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在我国还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历代王朝中能有几位可称得上是清贫的官僚？尽管也曾赐给一些官吏以“清白吏”的雅号，但这正好表明社会上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官员。清贫和廉洁只停留在字面上，到处见到的却是滥用权力索收贿赂，贪赃枉法，弄得社会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在喧嚷“清贫”的同时，又需要“安贫”之道。由此而产生所谓的“乐道”。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达到懂得会享受“道”的境界，不仅不能使一般百姓生活在清贫之中，也不能适应“安贫”。这种观念在儒家文化盛行的古代东方各国相当普遍，但在韩国，这种观念的表现似乎更加侧重于对人们欲望的压制上。“清贫乐道”、“安贫乐道”似乎在韩国找到了更大的市场。

在这种人生观影响下，君子不得接近钱财，更不能受其束缚，而必须生活在清贫“高尚”的精神世界里，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就个人来说，追求这样君子般的生活未尝不可。但把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不见得合理了。历史已经充分说明，这种社会意识是限制和阻止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该说，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有权争取生活水平的提高。何况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事实上，经过 70 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韩国人的世界观、消费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建住宅日趋豪华，筹办婚丧喜事愈加讲排场，穿衣打扮离不开高档进口货。有的甚至还把排场讲到国外，引得世人的惊讶和耻笑。早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这些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为此，他曾警告对这些现象要在报刊上公布，予以处罚。

迷恋现实的韩国神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开天辟地”的传说。根据传说，韩国的“开天辟地”是从“檀君”开始的。最早提及这个传说的《三国遗事》是这样叙述的：

“昔有桓国，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箇，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穀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愿化为人。

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性。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①

韩国人的这个传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众神和众动物向往人间，讲究现实。不仅是天上的神（即桓雄）向往和迷恋于天下人间世界，特意下凡到人类社会，就是地上的众多生灵（熊和虎）也向往人类，都希望变成人。这个故事中没有在其他民族传说中常有的诸神返回天堂的情节。这也与韩国的一句谚语相吻合：“宁居人间秽土，也不图天国仙境。”

一个民族的神是该民族思想境界的集中体现。韩国人的民族神迷恋人间和讲究现实，反映的是韩国人讲究现实、看重今天的人生之道。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韩国人中流行的“瞬间主义”，意思是干什么事情都缺乏长远的打算，看重的是眼前的效果利益。人们很少考虑明天，只要“一鸣惊人”即可。例如，全国 6000 多个茶店和咖啡店中，一半以上的维持不到半年就改变主人或业主。在一般工作岗位上，如果看不到晋升的可能性，人们也会自己想方设法找新的地方。

在韩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个人希望，也需要在短期内验证自己的能力，因

① 《三国遗事·古朝鲜》。

此，在自己所从事和担负的岗位上，人们都兢兢业业。这使韩国人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态度也十分负责，经常使前来参观的外国人惊叹不已。然而，另一方面，这种热情和责任心常常缺乏耐力，因为，如果每个人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这种热情和责任感往往一落千丈。

由于韩国人一般不太可能长期安分于一定环境之中，而是经常以改变环境的办法求得自己的“出头之日”，因此韩国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厉害。特别是在战后，由于经济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进一步强化了韩国人的流动意识，使离乡背井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学习、工作等各种原因而离乡背井过着异乡生活的人，1995年占韩国总人口的44.3%，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一些的全罗南道就占了44.3%中的60%，其比例最高。

“适时而定”的处世之道

有一个叫“庆州崔富者”的故事。自李氏朝鲜开始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个崔氏家族长期保持着在当地来说相当富裕的生活，家中连续十代储备着至少1万石的粮食。这在过去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了。这个家族能够连续十代保持富贵和繁荣，能够摆脱“富贵不过三代”的厄运，最基本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崔氏家族连着十代传下来的“家训”。这个“家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做官不得做到“进士”以上的官；第二，家族的财产不得超过1万石；第三，受灾之年不得买地。

这是韩国传统的处世之道，是古代维持家族繁荣最可行的办法。首先，这里的“进士”只不过是科举考试中通过乡试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严格来说还够不上是一个官职。但有这种荣誉或者是这种“官职”，也是有用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免去了被当局剥夺财产的可能。同时，这种荣誉又不至于卷入国家高层的权力之争，从而也避免了因这种争权夺利而出现的家破人亡的可能性。其次，家产不得超过 1 万石的规定也很明智。超过了这个水平，就要拿出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优待家中的奴婢。这有利于减少或杜绝这些奴婢产生对主人不满情绪的可能性。最后，受灾之年，往往有一些人为了生计要出卖农田。如果在这样的時候买地，容易给人以“趁火打劫”的嫌疑。因此，规定“受灾之年不得买地”也减少了得罪他人的可能性。通过这些办法，崔氏家族以“进士”为挡箭牌，以平常施点小恩惠为诱饵，适可而止地控制欲望，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自己“长远”利益。

“崔富者”的“生活方式”可被看做是韩国人传统的处世之道，即富而不娇，适可而止。在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人们的集团意识比较重，因此，如果有人过分富贵，态度又傲慢，就容易遭人非议，稍不小心就会遇到危险。

不过，“庆州崔富者”只是韩国人处世之道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历史上来看，韩国人讲究“面子”是很有传统的。早在本世纪初，在当时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不少“打工”的韩国人。据当时俄国管理人员的

评价，这些韩国人十分讲究“面子”，只要拿到工资，就给自己添加衣服之类的东西。因此，尽管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但在马路上凡是穿着讲究的东方人几乎都是韩国人。相比之下，中国人则更喜欢把各种收入攒起来，准备带回老家。

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使韩国人的这些消费倾向似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凡是去过韩国的日本人对韩国人的居住条件都羡慕不已。尽管他们的人均收入是韩国人的两三倍，但居住的房子却根本没法相比。在日本，面积为 60 平方米的房子已经使人喜出望外。即使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居住的房子一般也只有这个水平。但在韩国，一般公寓的面积都达到 100 平方米左右，很多人仍觉得不够宽敞，还想方设法继续改进。

韩国人的“轿车观”与他们的“房子观”很相似。尽管轿车在韩国普及的时间不长，但韩国人的“胃口”却很大。1987 年，韩国 92% 的轿车的排气量还不到 1500 升，仅过 2 年就降低到 71.7%，而豪华车的比重上升到 30%。更多的人则希望尽快改善自己的轿车。

爱面子的韩国人自然也看重自己或子女的结婚问题，不管开销多大也都要把它办得体面一些。因此，韩国人在结婚方面的支出也是相当惊人，在人均结婚支出方面所占的比重高出日本的 2 倍以上。据 1992 年的调查比较，1990 年，韩国平均结婚费用男女合计达 1769 万韩圆，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400.7 万韩圆的 4.4 倍，而日本的相应倍数却只有 2.1 倍。由于过重的

经济负担，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据 1990 年的调查，多达 37% 的新婚夫妇经历过因结婚费用问题而引起的不愉快事情。^①

1991 年 11 月 11 日的《新闻周刊》曾刊登一幅站在进口豪华轿车前面的韩国人的像，标题为《早熟的富豪》，以讽刺韩国的高消费现象，指出：“韩国人正忙于过分的消费热潮，使国家经济步入艰难的历程。”^②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有一次，韩国学者金大焕被问到有什么样的一句话能概括韩国人的特点，他一时想不出十分恰当的语言。这时，提问的人自问自答地说，“韩国人就像是酱板草那样非常坚韧”。

酱板草，学名叫马齿苋，是在各种杂草中生命力极强的一种，即使酷暑的夏天，在强烈的阳光下，其他的各类植物显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惟独酱板草仍然生机盎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肥沃的土壤里，还是在贫瘠的土坡上，只有酱板草不嫌弃大自然的“另眼看待”，顽强地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实现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从古至今，韩国人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坎坎坷坷，但他们像酱板草那样始终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勇气，在狭小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① 金德亨：《韩国的代案》 知识产业社，1993 年，第 70 页。

② 金德亨：《韩国的代案》 知识产业社，1993 年，第 69 页。